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零九期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编者的话：建党九十年，又现山河一片红：燕舞莺啼，红歌唱响。在锣鼓喧嚣中，几位学者研讨《邱会作回忆录》，倒也算闹中取静。

《邱会作回忆录》的出版，是当代史界的一件大事，其引发的关注尤甚《党史二卷》。至此，“林彪集团”的黄吴李邱各有史述面世，无怪乎丁东先生曰：文革史料开发和研究已进入了“吴李邱时代”。

囿于国情，中国当代史甚至比古代史更为扑朔迷离，其研究宛若考古，如《邱》著者提供了新史料、新史实，其意义自如重大考古发现。

正因如此，研究当代史已不是对史实的研究，而成了一个不断逼近事实真相的过程。

人们呼吁：“让事实说话”。然而事实上，事实不会说话，说话的是人。不用说有人出于“党性”，不讲真情真话，谓之“顾全大局”。即便出于人性，想讲真情真话者也会受个人立场、认知、情感、好恶以及利害的左右——作者如是，研究者亦如是。与会学者充分注意到这一点，不仅关注“说什么”，而且关注“谁在说”。雷颐先生在首肯此书的重要性的同时，亦要求取审慎的态度，指出作者“十分在意他们这一派的‘正统性’”。而吴迪先生亦指出，“学者研究所得，也不全是客观事实”。

当然在事实的背后，还有事理一层。与会者对书中涉及的山头、特权、密谋、军队特殊地位等问题进行了评点，若朝这一方向深入扩展，可构成一部中共的“体制特色学”。

体制乃是制度的根据，又是制度之总和。然而前述山头、特权、密谋、军队特殊地位等等本不是所谓正常制度。王海光先生在谈及江青干政和文革时期“家天下”沿袭传统王朝体制某些特征时指出：“新政权从形式上和立国的理论上，是对王朝的家天下体制的颠覆，在制度安排上没有王朝体制下解决内廷外朝矛盾的那一套方法。”新政权所秉承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反对一切传统制度的——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封建主义制度”。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正好助长了草莽时期的积习，特别是强力和权力可以无视制度甚至替代制度。但另一方面，实施统治离不开制度，因而，种种弊端又被固化于新的制度或与制度并存的政治潜规则之中。这种反制度的制度及潜规则凝结成体制并形成它的特色，致使强权无制约的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就文革史而言，可以理解为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在中国的一次激烈的实践过程——从发动、展开到鼎盛直至衰亡，为时虽不久，为害却甚烈，并以祸国殃民的惨痛代价证实了此路不通，预示了它的历史命运。所以，历史研究还有一层任务，就是在厘清事实、剖析事理的基础上探索历史发展的教训。

新史料的出现，填补了历史空白，可资改写历史，甚至对于既定的官史具有某种颠覆意义。但随着当事人的谢世，这一资源即将枯竭，历史学真正的解放，自当有赖于档案的全面开放，特别是学术环境的彻底自由

《邱会作回忆录》座谈会发言摘录

郑仲兵：这个座谈会是吴迪和李宇锋二位先生认真准备和安排的。受他们委托，我说几句开场白。

今天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主要不是文革史的专家，而是具有普适意义的学者和思想界的朋友。座谈会想以《邱会作回忆录》为引子，交流切磋《回忆录》所涉及的有关历史——对文革，对林彪及黄、吴、李、邱，对从九大到九届二中全会，直到审判所谓林彪集团的看法。

在座不少朋友都是文革的过来人，参与者，亲历者。40多年过去了，然而，对这段历史的痛切感受并没有淡漠；对它的深刻思考并没有停止。因此，我们的座谈会应该是既有历史感又有时代感的理性审视，无疑具有特殊的学术和思想价值。下面请大家发言。

阎长贵：关于文革的回忆录，有各阶层写的，各界人士写的，有海内外公开出版的，也有个人自费印刷的，其数量无法统计，真可以说汗牛充栋。每个人写的回忆录，对了解和研究文革都有一定的这样或那样的参考价值，都值得看。从接近或参与中央决策者的著述来看，到现在有5个人写了回忆录，一是《王力反思录》，二是穆欣《劫后长忆》，三是《吴法宪回忆录》，四是《邱会作回忆录》和《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之子程光著），五是《李作鹏回忆录》，当然还有吴德、傅崇碧等人的回忆录。几年前，我在《吴法宪回忆录》的座谈会上说：“到现在（指那时）为止，吴的回忆录，是对了解和研究文革最有价值的一本回忆录。”现在可以和应该说：“吴李邱的回忆录都是了解和研究文革最有价值的回忆录。”这样说，我认为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在写回忆录的人中他们的层次最高了，都是政治局委员（再就是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反思录》，对了解和研究文革也是比较有价值的，穆欣的《劫后长忆》就差了），他们的回忆录都披露了上层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历史资料——很多资料恐怕是历史档案中都查不到的。在这些资料中不少是很惊人的，如毛听说林彪逃走后，说：“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意思是说他可以任意处理了），邱在回忆录中不只一次说到这件事，还说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这句话；李在回忆录中认为，放走林彪主要是总理和汪东兴的责任，而他俩免责了，我（指李）却被判了刑。等等。有些作者应该说是了解文革很多情况的，但他们的回忆录忌讳比较多，比如《陈丕显回忆录》、吴德的《十年风雨纪事》。这里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对了解和研究文革有价值的回忆录都是在海外出版的。

今天我仅就吴李邱回忆录谈点看法。我认为，吴李邱回忆录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都比较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吴法宪回忆录》刚出来时，王年一说过：“全书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忠厚老实。”对这几个人的回忆录都可以这样说。看他们几个人的表述：

吴法宪说：“十年动乱转眼之间早已成为历史，成为了人们所关注的历史学术问题。由于这一段历史过于敏感，所以对这一段历史资料进行了极为严格的控制……这样一来，这一段历史，按照有些人的说法，像是一团谜一样。我感觉到，当时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本身不清楚，而是出于利害关系和实际需要，不想说清楚，或者不许别人说清楚。”“文革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当事人和见证人，现在已经不多了，所以我感到有必要把我所亲身经历的这些事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说一说。我说的这些是不是事实，自有大量的档案可以佐证。有朝一日这些档案材料公布的时候，大家完全可以拿来加以对照和检验。”（982页）

李作鹏说：“我知道历史必须实叙其事，禁止伪言浮文。在重要的问题上，每个字、每

句话、每个过程和细节都要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否则是不严肃的，不郑重的，是骗人骗己的。”（第2页）

程光转述说：“父亲（指邱会作）到这般地步，还有约束他的吗？他说有，这就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宁可少，不可滥；宁可精，不可杂；只可准，不可误。”（《心灵的对话》第2页）

应该说，这几部回忆录都比较忠实地实践了他们的承诺。

二、都十分明确地指明了文革的责任。吴回忆录有两段话说：“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是我们几个人，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内，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不能说牵连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牵连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第978页）

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说：“在贺龙等老同志的治病问题上，说林彪（也包括我）是诬陷，而毛主席是犯了错误，周总理是做了违心的事，说了违心的话，这是对历史的编造。”（第887页）

这就是他们的共同逻辑。我在李作鹏的回忆录里没找到类似的话，但字里行间都可以明显地看到他说的文革的责任也是十分明确的。总之，他们一致认为文革的一切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都是毛主席做出的，毛主席是文革的主要责任人。这个看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都披露了文革中一些重要事件的真相。文革中的罗瑞卿事件、杨余傅事件、九届二中全会、“九一三事件”，吴李邱回忆录都说得比较新颖，比较可信。

这几部回忆录可以互相印证、补充，对同一事件不同的叙述，也为读者和研究者选择材料或思考问题提供了空间。

如罗瑞卿事件，吴法宪的叙述和邱会作的叙述就有不同：虽然他们都认为最后决定者是毛泽东，但对于林彪的态度，他们说法不太一样，邱说林彪完全是“被动”的，吴说这事是林彪“提出问题”的。这很值得研究。

再如，《邱会作回忆录》与《心灵的对话》中邱会作关于江青和叶群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进入政治局的事，叙述就有不同。在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第一次提出的名单上究竟有没有叶群，名单是先送毛再转林，毛划去江青加上叶群、林又划去叶群未加江青，还是林比毛“早看到几小时”而划去叶群？这些细节是有出入的，因为它们传达的是不同的历史信息和政治含义，所以值得进一步考证。

吴李邱都是开国将军，他们年龄和经历很相近，文革中遭遇也基本相同，他们的回忆录十分珍贵，是对历史研究，特别是文革史研究的巨大贡献，是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

丁东：吴、李、邱的回忆录是各自写作的，写作时间基本同步，但是出版有先有后。《吴法宪回忆录》出得早，李作鹏生前可能看过，整理《邱会作回忆录》的邱会作儿子也看过，但是《李作鹏回忆录》和《邱会作回忆录》，吴法宪没机会看到。后定稿，后出版，有可能参考先出版的回忆录，有所借鉴。在比较几部回忆录时，这是值得考虑的因素。

这些回忆录虽然都是身后出版，但他们活着的时候都有了成型的书稿。为什么不能在生前出版？其实在他们生前，都有出版人前往联系。但他们有顾虑：如果回忆录在香港面世，会不会激怒高层，影响生活待遇和医疗待遇？因为他们几个人到最后，生活和医疗待遇还是可以的，公家配了汽车，房子也不错，生活费标准也不低，医疗也享受高干待遇。他们知道自己回忆录的份量，所以放在身后出版风险较小。

他们的回忆录有一致的方面，也有差异。我看了《李作鹏回忆录》和《邱会作回忆录》，能感受到他们写作心态的差异。邱会作出了秦城监狱，放到西安保外就医。最初当地官方对他态度不好，让他生活上遭遇不少困难，这使他晚年有了更强的反思动力。他对自己亲历的

革命过程中的负面因素，对这个体制的某些深层积弊，有切肤之痛，不吐不快，所以他揭示的重要历史细节特别多，填补了历史空白，对官方话语有很强的颠覆性。而《李作鹏回忆录》篇幅虽然和《邱会作回忆录》相近，但战争年代和建国后军队工作的篇幅比较大，文革中和下台后的篇幅比较小。他回忆战争年代，未尝没有在国内以某种方式发表的想法。这些内容，与文革前的革命回忆录有相似之处。李作鹏走出秦城监狱以后，在山西太原保外就医。据我观察，山西对李作鹏安排得比较好。当时我家离李作鹏家那栋楼不到100米。他住二层，一梯三户，三个单元都向阳，有暖气，其中一个单元是小三居，留给公安厅值班室人员（主要是拦记者，当然也限制李作鹏的活动范围），还有一个小四居、一个小两居，分别给李作鹏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住。在八十年代前期，这样的住房条件比普通市民强多了。当时我经常看见李作鹏在院里溜达，周围邻居对他态度很友好，同情而非敌视。在李作鹏刑满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官方告诉他中共中央对他有若干特殊规定，其中一条是战争年代回忆录可以写，可以发表；文革年代回忆录也可以写，但发表要经审查。这种导向，可能正是《李作鹏回忆录》里写战争年代东北打仗篇幅特别大，特别详细的原因之一，他把主要的力量用在这方面了，还是想在国内出版。其实，他进入政治局以后的经历更重要，着墨反而不多。

《吴法宪回忆录》之所以能够先出，吴法宪的夫人陈绥圻的作用至关重要。她是上海教会中学毕业生，在黄、吴、李、邱的夫人中文化修养最高，吴法宪写回忆录她帮助抄写，吴去世后她说“就按原稿出，谁也别乱改”。所以《吴法宪回忆录》出得最早。从史料学的角度看，这部书一出，文革研究就进入了“吴法宪时代”。

今年，邱会作、李作鹏的回忆录都出了，程光的《心灵的对话》也出了。我觉得，文革史料学就进入了“吴李邱时代”（可惜黄永胜留下东西太少。据说有一点录音带。他儿子写的《军人永胜》我也看了，不少史料还是从吴、李、邱这儿找回来的）。

国内公开出版物的文革表达，无论是官方机构编纂的正史，还是汪东兴的回忆录，价值都不能和吴、李、邱回忆录同日而语。吴德的口述史里有一点真东西，但只占全书的一小部分。还有那些以老一辈革命家身份光荣退下来的人的回忆录，比如《陈丕显回忆录》，已经受到史学界的质疑。

《邱会作回忆录》的价值不限于文革。他参加红军以后大部分时间做后勤工作，对党和国家财政经济机制运行的内情有深切的感受。他的回忆录，给我们从经济的角度理解中共党史提供了新史料、新视角。比如红军东征的动机，延安大生产的起因，为什么派他到新四军那儿去筹款，军队为什么在三年困难时期从事农副业生产，五七指示的由来，还有中国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他的回忆都很重要。举个例子：红军为什么东征？过去说是为了抗日。为什么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其实陕北那一小块儿地方，养不活这些军队嘛。邱会作绞尽脑汁，也筹不到足够的钱粮，红军将领找他要钱，要物资，他拿不出来。东征一次，几十万大洋就从山西弄回来了。这跟抗日有什么关系？

邱会作的手稿据说有二百万字以上。《邱会作回忆录》是路光联系出版的，《心灵的对话》是程光撰写的。两部书一致的地方很多，但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刚才说到九届一中全会的组阁过程，两部书的说法有差异。我跟阎长贵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到底谁更可信？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小组拿出一个政治局候选人名单，《邱会作回忆录》说是毛先在江青的名字上打叉，加上叶群，林又在叶群的名字上打叉。《心灵的对话》说林先在叶群的名字上打叉，毛后在江青的名字上打叉。我认为名单应当先送毛，不是先送林。先送毛，林可以顺着毛。如果先送林，不是要把林的意见强加给毛吗？两部书的说法不一样，不知各自根据邱会作哪些手稿。九届一中全会组阁过程的史料太重要了。因为周恩来、康生、黄永胜都没留下回忆。毛和林批过的名单不知中央档案馆有无保存。即使有，一般研究者肯定见不到。是毛泽东先勾掉江青加上叶群，还是林彪先勾掉叶群，里面学问太深了。目前，我倾向于相信《邱会作回忆录》的说法，虽然程光的《心灵的对话》思想性很强，很有深度。

程光的书里有一处保留了几百个方框，表示这里删去多少字，联系上下文，应该是对王洪文受酷刑的回忆。在香港出书，还要打方框隐去一些内容，可见触目惊心。酷刑用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这一级人物，不是一般人能够决定的。

（**邢小群**：说到王洪文我就想提一个问题。王洪文跟邱会作提到，毛泽东对于他们的处理好像是比较温和的，毛说了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他很明白，林彪事件跟黄、吴、李、邱其实没太多的关系，无非是他们关系好，但在政变问题上没有关系，所以后来有两次想安置他们，但在关键时候让汪东兴给挡住了。毛泽东的态度是不是想安置他们呢？）

我觉得邱会作这样讲，有他的考虑。八九十年代写回忆录的时候，当政者不给他平反，他有意见，就想拿毛的话说事儿。潜台词是，毛都要放我出来，你们为什么判我刑？其实，不同时候的当政者有不同的策略。毛的办法是，开除你的党籍，把你定为反党集团，搁在北京卫戍区，让你吃好吃点，这是毛处理政坛下台者的一种方式。到了邓时代，他用的是另一种方式，先公审你，判你有期徒刑，再让你保外就医，给你差不多的生活待遇，这是邓处理政坛下台者的另一种方式。吴、李、邱晚年看到有了一定的表达不同见解的空间，不服官方的政治审判，于是借毛来说事。《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邓小平和陈云主导的，评价历史的宗旨当然是他们两人利益最大化。无论林彪案还是高岗案，翻过来都不符合他们利益最大化的需要，这就是政治。

雷颐：这本书我觉得非常重要。文革当中最大的派系之一，从前完全被销声，不允许他们说任何话，只有一个声音就是中央文件。正式党史书上那些话，往往谈不上做研究，而我们做研究的又苦于没有任何材料，那么这几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大量非常珍贵的史料。

对于这些材料，我觉得要采用客观的立场，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里面涉及很多事情、矛盾，但有些对于我们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比如邱十分在意他们这一派的“正统”性，虽然对毛的权术、尤其文革中的权术写了不少，但又作一些辩护。

此书里面大量文革和非文革的史料最为重要。很多东西我们从前知道，但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发表的，邱会作现在公开发表出来了，并有许多细节。比如说整 AB 团，怎样把人弄死，他回忆说怕有人喊口号就把一个树枝插到被执行人的嘴里。他还写到子弹是很珍贵的，开始用刀砍，刀砍的效率很低，后来用石头砸，他亲眼看到砸得人脑浆迸出。还有，我知道文革开始时上海最有名的造反派头头是潘国平，但突然倒了，具体情况一直不太清楚。这一次邱会作写得很清楚，因为军队参与了，王洪文与潘曾经是战友，但后来争权夺利矛盾很深，军队倾向王，采用特殊手段了解到潘国平有一些男女关系上的事，把这个材料提供给王洪文，王洪文利用这个把潘国平打倒。

《回忆录》大量涉及了军队供应。实际上，中共始终没完全脱离军事化的管理，最好的东西、最关键的东西就是由军队的后勤供应。作为总后部长，邱直接为最高领导人的生活服务，了解最多，他这方面写得不算多，却极为重要。从这里面，就能看出有大量的不平等，比如说长征一开始就规定了哪一级领导可以躺在担架上，怎样配担架。有人说那个时代人人平等，读了邱会作的书，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这本书透露出很多档案里没有记录的东西。有很多东西是密谋，是几个人说话就决定的，这些是不会有档案记录的。这本书，还使人对“党文化”的理解更加深刻，它不是按照规章制度而是按权力来运行的，这种“党文化”在文革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圈阅文件”怎么来的？据他说，实际上就是毛开始，画了圈就是圈阅了文件，执行者不好准确理解圈阅者的态度，但圈阅者却有相当“灵活性”。这种“党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

有一点邱说得很明确，不是“我们”和谁有矛盾想打倒谁就能打倒谁，实际上是毛利用各种各样的矛盾来打倒他想打倒的人。他要打倒罗瑞卿他也就知道罗瑞卿和谁有矛盾，要打倒贺龙、林彪都是如此。毛利用一切能利用的人，达到他的目的，想打倒谁就打倒谁，邱会作

把这一点写的很详细。他还明说共产党的军队是有山头的，有几个山头，这是战争年代历史形成的。

有些历史事件很重要，但我认为他仍没说清楚。比如为什么毛要把贺打倒？邱会作说：那时说有人要搞兵变，我们这边就做了预防准备。他没说是贺龙要搞二月兵变，就说“有人”，指的是谁？恐怕还是贺龙。我们现在大概情况应该是清楚的，根本无此事。邱会作一方面多次说除了毛没人能动得了军队，甚至林都无法调动军队，但又说有人要搞兵变，这是矛盾的，实际上隐含了他对林系人马参与打倒贺龙的一种辩护。

还有一个地方含糊的。林彪事件出来之后，中央传达了毛给江青的那封信，显示毛对林彪早有警觉。当时，许多人觉得这封信是事后假造的，为了显示毛的英明。但要按照邱会作的说法，确实有此信，江青早就让叶群看了这封信，那么也就是说林早就知道毛对他另有看法了。但究竟江青让叶群看到的这封信是原信还是经过后来修改的？他写得具体到“江青专门从褥子下面拿出来，用报纸遮住让叶群看的”。按此说法，1967年林就知道了毛对他有看法，后来他仍与江青那样激烈斗争？

作为研究者总是要站在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不是站在某一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回忆者不是研究者，不可能是全方位的描述。第一他是从自己亲历的视角，可能某些事情更准确更生动，那些细节、事情很珍贵，但他毕竟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第二，人总是按照自己的立场和遭遇，对一些事情作辩白。邱会作讲到文革初期红卫兵破四旧时说：“国家财富和文化遗产遭到无法挽回的损失，但毕竟是对物不对人。”实际上那时打死多少人呀！打死的是“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知识分子，但他根本就不介意这些。为什么？他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当时没有把矛头指向“我们”。我觉得这还是立场问题，潜意识中那些都不是“人”，“对物不对人”是指不对“我们”。直到后来“打走资派”，他认为是打“我们”，才叫“对人”，才明确认为是根本不对。

有好多地方他明显是辩解。比如打倒罗瑞卿、杨成武，责任确实在毛，但他这里面写的林彪与他们几人几乎是毫无责任。讲到杨成武就是杨成武这个人怎么不好，讲到罗瑞卿就是罗瑞卿这个人手伸的太长，又霸道，等等——这恐怕都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们是毫无责任的。

说到打倒刘、邓，他说林彪参与了，但是是因为毛要打倒刘、邓。他说他们支持毛打刘、邓是因为“谁反对毛我们就要打倒谁”，我们这一代就是对毛有浓厚、特殊的感情；好，如果按照这一逻辑，那后来林彪跟毛有冲突有矛盾的时候，就应该坚持“毛要打倒谁我们就打倒谁”。但在他那里，打倒刘、邓的逻辑不能用在打倒林彪上。为什么呢？刘、邓反毛，他认为是错的；林彪反毛，他就认为是对的。如果按照他前面的逻辑，那林彪就该打倒，如果按照后面的逻辑，只要毛有错误就应该反对，那刘、邓就不应该被打倒。这里的思想观念有巨大的矛盾。这种矛盾，可能是真实的思想矛盾，也可能是为支持打倒刘、邓自辩而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所以，做历史研究一定要读所有人的回忆录，要尽量谨慎的用其它材料去对照印证这些事情的真实性。

总之，邱会作的这本书特别珍贵，提供了大量的细节性的东西，不光对林彪事件，对中共党史、军史、后勤供应等都是非常丰富的一本书。而正因为它特别好，我们就更应该在读它的时候用研究者的心态，来研究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

王海光：《邱会作回忆录》是中国当代史一部值得高度重视的当事人回忆，史料价值非常大。它不仅是研究林彪事件的一部必读书，而且也是研究军史、国史，特别是了解“文革”高层政治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书。这本书连同前几年出的《吴法宪回忆录》，新近出的《李作鹏回忆录》，这些林彪事件“反方”人士的历史回忆，是在多年监禁审查的特定环境下形成的，作者对经历的事情细节都有着反反复复的强化记忆，许多历史场面可以说是深深地刻在

脑子里的，所以他们有着超强的恢复历史细节的能力。这一点是其他的回忆录无法与之相比的。邱书给我们第一个深刻的印象是，邱在历史场景的细节上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回忆的事情经过非常详细，人物神态非常生动，使我们读起来有一个历史场景的画面感。

黄、吴、李、邱是林彪事件的当事人，他们的申辩过去人们知道的很少，有关林彪事件的一些问题，基本上来自官方的材料。这样的历史叙述是很不完整的。就是我们这些搞研究工作的，过去虽然对他们的情况也知道一点，但很不具体，特别对那些细节性的东西不太清楚，一些关键性的史料缺乏，遗留的疑团很多。在邱等人的回忆录中，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有些情况完全是前所未闻的，很多情况恐怕在绝密档案中也是看不到的。他们给我们揭开了历史被遮掩的一面，揭示了许多内幕性的东西，大大丰富了我们的历史认识。比如说：打倒罗瑞卿的问题、打倒贺龙的问题，邱书给出的解释比以往的一些猜度性解释更能让人信服。这些回忆录的出版，等于给历史提供了被告方的申述证词，相当于正方和反方对簿公堂，对官方关于林彪事件的既定结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尽管他们的回忆录也都会有个人的局限性，都有非常强烈的为自己辩诬的动机，但各有各的价值，各有各的视角，可以构成一个互证关系，这无疑是为复原这段历史的真相提供了新的证据，使我们对当时历史情况的了解更加丰富了。

与吴法宪、李作鹏的回忆录相比，《邱会作回忆录》在深度和广度上更加展得开。这与邱的个人经历和工作性质是有关系的。在卷入林彪事件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四个人中，邱会作的涉案程度是最轻的。邱长期在一线做军队后勤工作，与周恩来的交情非常深厚，总后与国务院打交道的事情也最多，在“文革”中更是在相当程度上承担了国务院的许多事务。周恩来当时讲，总后是一个小国务院。邱会作从“山头”上属于“红双一”的，要从党内“圈子”的意义上讲，邱会作更应该划入周恩来的人脉“圈子”。所以，邱书中对周恩来的形象描写很细致，比其他著作都要丰满的多。

我们研究政治问题，离不开两个层面的东西，一是人事，一是财政。任何实际的政治运作都需要财政的支持。军队工作也好，政府工作也好，财政问题是最实际的问题，政策问题离开钱财物都是无法实现的。邱会作长期在一线主持军队后勤工作，军政两界都很熟悉，对党内的人事关系了如指掌，再加上超强的记忆力。所以，邱书对林彪事件发生的来由讲得更深入，展现的历史视野也更开阔。

我们说邱书的价值很大，不仅是指它提供了解读林彪事件的一些关键性的史料，而是从多方面说的，具有多重价值。如军队后勤建设、“文革”中的军队、“文革”中央高层矛盾、党内和军内山头问题、党内专案制度、“两案”审判的情况等，邱书都提供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

从人事上考察政治和历史，是邱书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共党内长期存在着山头问题，这是打天下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从大的方面讲，根据地和军队是一块，白区党组织是一块。从小的方面讲，一块根据地就是一个山头，一支部队就是一个山头。一个大山头下又有许多的小山头，军队中有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中又有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层层叠叠，关系很微妙。毛泽东在七大上讲，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逐步消灭山头。他是各个山头的共主，具有驾驭和平衡各方的绝对权威。在建国以后的党内政治斗争中，不同程度地都有山头问题掺入，是一条起着很重要作用的副线。如高饶事件的发生就有着军队、根据地山头和白区山头的矛盾；在“文革”中，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也有山头矛盾，在军队内部的斗争中也有山头矛盾。

从军队山头的情况可以看出，毛泽东一开始搞军队时，在井冈山建立的部队是红四军，以后扩大结合了彭德怀的部队，组建了红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林彪的红一军团、彭德怀的红三军团，都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与毛泽东关系很密切。但最密切的还是红一军团，与毛的历史渊源最深，是嫡系中的嫡系，相当于毛的“御林军”，紧要关头都是靠它

保驾护航，出的元帅也最多。毛选二卷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林彪事件出来以后，都说是批林彪的，说林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其实，在原文中毛泽东点名批判的游击主义是指彭德怀的。在战争年代，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一直配合得很好，有时是相互指挥，但两支兄弟部队也不是没有矛盾的。

建国后，毛泽东掌军权是靠红一方面军的人，首先用的是彭德怀红三军团，即“红一三”（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的人。打倒彭德怀后，才开始用“红双一”（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代替了“红一三”。这是一个过程。在批彭德怀中牵涉的许多问题，有一些是历史积怨，有一些是建军路线的问题。彭德怀强调正规化现代化，比较重视苏联红军的经验。林彪更熟悉毛泽东的心思，搞了“三八作风”、“四个第一”等等东西，突出政治，形成以毛泽东思想为统军主导思想的政治建军路线。让“红双一”主政，固然是毛泽东最放心的，但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就是用人面越来越窄了。特别是贺龙被打倒以后，只剩下“红双一”了。林彪事件出来后，毛泽东用的是过去一直被冷落的红四方面军的人。

“文革”时期，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一派人马主要依靠的是军队的力量。刘少奇打倒后，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和林彪为首的军队派的矛盾突出出来了。这就给我们展现出来另一种历史图景。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我们都感到震惊和不理解。当时我听到有大学历史系老师私下讲：林彪事件的出现并不奇怪，这实际上是历史上内戚和外臣的矛盾斗争的延续。这个观点给我印象极其深刻。现在有许多新材料披露出来，再看这个观点更加有新的认识了。

江青在“文革”中近乎病态的嚣张跋扈，对周恩来都是呼来喝去，和她在延安时期的贤妻良母形象完全是判若两人。这是权力对人性的异化，制度对人性的异化。林彪事件的发生，是军方与“文革派”长期矛盾的爆发，从中可以看到共产体制内部的一个真实发生的历史逻辑。1949年中共建立的新政权，是在否定了王朝体制，推翻“三座大山”的名义下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但是，这个新政权却延续了过去王朝体制下的内廷与外朝、内戚与外臣纷争不已的固有矛盾。过去几千年的皇帝居中持要的中央集权体制，在解决这个矛盾中已经有了一套办法，如不允许内戚宦官干涉朝政等等（但往往一到王朝末世，这个矛盾又反复出现，这是王朝体制与生俱来的痼疾）。新政权从形式上和立国的理论上，是对王朝的家天下体制的颠覆，在制度安排上没有王朝体制下解决内廷外朝矛盾的那一套方法。从建国后党内路线斗争的情况不难看出，过去王朝体制的这种旧矛盾没有解决，而是在共产体制下再度发作起来了。在“文革”中为何出现了“家天下”？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问题。

林彪为首的军方集团与江青为首的“文革集团”的矛盾斗争，学界一直认为是林江两个集团争权夺利，我过去也是这样看的。现在大量的当事人的材料出来，特别是邱书的出版，使我们感到这种看法其实是比较浅薄了。从根本上讲，这还是传统王朝政治的内廷和外朝的体制性矛盾。江青的蛮横跋扈，有些是毛指使她干的，有些就是她仗着自己的国母身份去胡来的。正如江青给王光美说的：由她出头来干，干对了，是毛主席的；干错了，是她江青的。对江青的忠诚，毛泽东是毫不怀疑的。这样，江青一伙和跟着毛打天下的这些从龙之士产生了矛盾。对毛泽东来说，一方是有很深历史渊源的“最亲密的战友”，一方是“最亲密的老婆”，这两方的关系权衡起来肯定是很伤脑筋的。

在对“文革”的态度上，邱会作有着鲜明的军方立场：对毛泽东、对林彪、对周恩来都是有深厚感情的，即使被整了，这份老感情还在；对造反派则是誓不两立的态度，并把这种态度带到了中央高层政治的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从历史上看，在打天下的时期，良将比老婆更重要，军事集团领袖对老婆是不太在乎的。甚至可以把老婆杀掉来要一个忠臣良将，但在坐天下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老婆是“家天下”的重要成员，臣下对她的怠慢也就是对君主的怠慢，这是对君主权威的大不敬，是逆天大罪。之所以军方的这些人在处理与江青关系方面会一再发生误判，恐怕是没有了解打天下和坐天下时老婆问题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搞不清楚毛泽东与江青的政治关系，对毛忠诚没有二话，对江就不一样了。

他们不清楚，在“文革”中，毛江不是单纯的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更是政治上的同谋。特别是再有汪东兴的传话挑唆，他们就更吃不准了。汪是大内总管，也是内臣一系。所以，他们对汪是特别有看法的。其实，汪传的话，未必是假的。但毛善变，汪的政治水平低，只看到毛、江生活的一面，没看到他们是政治同谋的另一面。

邱书披露了这方面的史实。特别是周恩来给黄、吴、李、邱讲什么是“中央政治”的那一段，非常重要。周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同志的关系。这个话讲得既简单通俗，又深奥无穷。毛泽东是全党全军的政治轴心，他向哪边，哪方就占优势，它方就是败势，各方的意图只能在毛的认可下才能实现。而在猜度毛的心思方面，江青无疑是有着明显的优势。林彪具有储君身份，不仅战功卓著，在树立和维护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中是挂头牌的，是毛搞“文革”的护法神，在打倒刘少奇中又立下了新功。他们的复杂关系，也就是周恩来能处理清楚。他对江青的隐忍能力，是其他任何人都做不到的。周给邱等讲：“大家都知道延安整风，但延安整风的成果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才能使用”。这话讲得太有政治艺术了。周对毛、江关系的把握，军队这批人是望尘莫及的。

这里还要说一下《邱会作回忆录》和《心灵的对话》这两本书。这两本书在史料上是有互补性的，有些在《回忆录》中没有展开的，在《对话》中讲得更详细。《回忆录》的写作和《对话》的写作是不一样的，《对话》写作是一个文体呢，还是就是有一个真实的对话？从现在看来，更应该说是一个文体——程光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写作的，原始材料可能是邱会作的。因为我们看出，程光提出的许多问题和下面邱的对答是不太接的。这就给我们使用史料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说邱会作讲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作为儿子，作者可以随便提问，但回答是不是都是真的？有没有作伪的痕迹？有些地方我觉得有些问题。比如：《对话》中讲毛泽东 1966 年 7 月 8 日给江青的信，江青神秘秘地给叶群看。这个时间林彪、叶群、江青是在北京吗？林是在大连，江青在上海。如果确有“看信”其事，看的也应是 1967 年 8 月毛写给江的信。再比如珍宝岛的战斗，《对话》中邱说：我们一个营打了苏军的一个团，而且这是一个遭遇战，打出了我们的军威、国威之类的。这个事情我们现在都清楚了，珍宝岛是我们谋定而后动的一次伏击战。他这样讲法就不像在高层参与决策而熟悉这场战争过程的人。

正因为我们非常重视这部书的价值，我们才更应该知道邱会作本人是怎么说的，他叙述的心态是什么，整理者怎么用的材料，如何做的过滤和取舍。这些问题是要我们重视的，因为关系到我们用史料中间怎么把握的问题，以便于对于它所反映的历史事实有一个更确实的认识。

周七月：我不是作为学者来参加这个会的，我也没有专门研究文革。我觉得这几本书，吴、李、邱的这三本回忆录再加上《晚年周恩来》、《高岗在北京》，基本上勾勒出一九四九年以来（以及此前）党内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官方的表述基本上被推翻了，基本上可以看出这些就是一个皇朝内部的斗争，而且是以毛的阴谋为主线。这些书非常宝贵的是资料价值。

咱们今天讨论以《邱会作回忆录》为代表的这几本书，有两个事情我比较警惕：第一他们都觉得冤。冤在哪儿呢？冤在他们认为“我还是共产党员，我还是忠于毛泽东的，你们怎么就把我给打成反革命了？把我抓起来了？我就参加了共产党没参加别的党”。所以他在写书时这个调子会成为一个主调。然后他里面有避讳，比如说他们这几个人在文革中起的坏作用，有还是没有？按他们的说法就都没有，他们都是正确的、捍卫的、平和的。那我们所经历过的，看得很清楚的事情等于说都被这些回忆录给抹杀了，这个我觉得是值得警惕的。毛、周旗号不能倒，我觉得这是这三本书共同的态度。第二，就是讨好历史。他们想在历史上给自己划一个无罪的线。这条线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这个问题实际上跟第一个问题是连在一块儿的。文革时“我们”没有错，“我们”干的都是对的，尤其是跟江青作斗争，所以“我们”

才落了这样的下场。这个逻辑本身有它正确的一方面，有它是事实的一方面，但也有态度上讨好历史的方面。

对这两点我个人是这样认识的：文革中，林彪也好，林彪这一拨儿人（或者叫“林彪集团”）也好，是起过一个大的作用的，没有他们的支持，在前期和中期推波助澜的话，不会有这么多惨烈的事情发生。“大三军”和“小三军”的事，大家记得很清楚，因为我的朋友圈子是高干子弟，包括军队子弟，耳闻目睹，军队里一大批将军被整得非常惨，这些作者作为当时得势的军队主要负责人完全没有责任？像他们这样轻描淡写的说一下，“我就整了一两个人，我给他们道歉”，那是不对的。

再一个，咱们衡量一下所谓“十次路线斗争”，就是这一次的翻案倾向是最厉害的，这跟这些人的子女在，跟军队里的人不服气都有关系。另外，跟他们后来待遇好也有关系，你比如说江青集团就没有那么好的待遇，他们也没机会写（当然江青集团是一个最糟糕的集团，老百姓、政治家、学者们想给他们翻案的都少之又少）。

另外，这些书还提醒我想起一些事：到底叶剑英和周恩来在所有的事件上起的什么作用？比如叶剑英吧，罗瑞卿事件，按照邱会作的说法，根本就是叶剑英和聂荣臻他们要打倒罗长子。文革初期，叶剑英当着几万人吹过林彪：“都说他有病，经过身体检查，每一根头发都检查了，是没有病的，他要活一百多岁的，他是能够领导我们的。”后来整个文革期间，叶剑英参与了从二月逆流到抓捕四人帮的一系列事件。有人说叶是总理在军队最好的代理人、最好的朋友和最好的合作者。那总理又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

你们作为研究者可能研究的更深一点，但我喜欢看大历史，把这几个关系这么一比，特别是去观察总理、叶剑英在文革中的作用，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吴迪：我的文革研究，重点在文艺。各位要问我江青的审美观与文革文艺的关系，我还知道一些。对文革中的军队，对林彪事件，我知之甚少。几年前读了《吴法宪回忆录》，受了启蒙教育，对林彪事件有了一点认识。这次看了《邱会作回忆录》和《心灵的对话》，我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我很感谢邱会作先生。在读这两本书的过程中，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邱会作是精英，他的才能、智商、悟性、意志力、心理素质都是强者中的强者。他的才干不能为国所用，固然可惜。但他留下的这两部著作，也令我们少了些遗憾。

好话大家说了不少，我同意，不重复。我不善于锦上添花，更善于鸡蛋里挑骨头，下面就是挑的结果。

一、回忆录的盲点——林彪治军。邱会作对六十年代的军队建设没有反思。换句话说，他沿袭了官史对林彪治下的人民解放军的评价。

没有林彪的支持，毛泽东搞不了文革，这已经成了共识。林彪是用军队来支持毛的。那么，为什么林彪治下的军队成了毛发动文革的依靠？我的看法是，那时的军队学毛著最好，对毛最忠。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

林彪从1959年开始主管军队，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等等，都出自林彪。在这类发明中，贯穿着一条红线——学毛著。刊载“毛主席语录”是《解放军报》的发明，将毛语录制成小红书，人手一册，也来自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是林彪的指示。

林蕴晖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1960年举行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与1958年反教条主义、1959年批彭德怀这两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一次重塑毛泽东思想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开启了把毛泽东推向神的大门。”

可以说，林彪接替彭德怀当上国防部长、军委实际负责人之后，干的最大的最持久的事，就是把人民解放军变成一所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一所造神工厂，一座宣传现代迷信的教堂，一个培养极左思潮的大本营。

周恩来 68 年 3 月 24 日在驻京军队干部会上的讲话中称赞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的功绩：1961 年“首先在军内出版了《毛主席语录》，然后很快推广到全国，直至全世界，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这一红宝书把毛泽东思想所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众化了，使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以至于全世界人民中都得到了广泛传播，从思想上武装了亿万群众，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有力的舆论动员，并且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段话从反面证明了林彪以毛泽东思想治军给中国，乃至世界造成的巨大损害。

林彪要全军学毛著，毛泽东投桃报李，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学解放军什么呢？就是学他们学毛著。学的结果，就是把林彪的那一套庸俗化形式化造神化的洗脑运动，从军队传染到地方，林彪的愚军运动扩展成了愚民运动。

邱会作对林彪的愚军非但没有丝毫认识，反而把这些算做林彪治军的功绩。这是此书的缺点，作者的局限性。当然，这并不是邱会作一个人的认识，也不是“林彪死党”的认识，而是主流话语的认识。

二、回忆录的糊涂——林彪之冤。与林彪治军的问题密切联系的，是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自 1958 年重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提出正确的崇拜和错误崇拜以来，党内的阿谀拍马之风大盛。而在这个吹拍队伍里，表现最突出，影响最深巨的就是林彪。可以说，林彪是造神的冠军，是宣传个人崇拜的健将，是将中共推向封建主义泥淖的重要人物。

《邱会作回忆录》对这一点没有认识。书中用了大量篇幅讲述林彪与江青的矛盾，林彪怎样与江青进行斗争。虽然书中也提到了林彪对江青的吹捧，但主导倾向还是替林说话。一是说林这样做是多么的不得已。二是说林彪的讲话中，深藏着什么抓生产的微言大义。换一句话说，《邱会作回忆录》没能免俗，加入了替林彪鸣冤叫屈的大合唱。

我认为，对林彪的冤得做些分析。什么叫冤？无故受到指责或处分，无罪被说成有罪，是为冤。林彪没反党，更没反革命，也没证据说他谋害毛，可非要这样说，那是冤，冤得很。林彪吹毛、造神、搞个人崇拜和现代迷信，将谄谀之风从党内刮向了社会，坏了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按谄谀罪判林彪，不冤。

林彪的问题是罪非所罚，罚非其罪。他本来是在道德上犯了罪，却非说他是政治犯。就好比是一人盗版印书，却判他颠覆国家。生产毒牛奶，却定他里通外国。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逼供为根据，以需要为准绳。势必要造成这种罪与罚的错位。

《邱会作回忆录》没弄清楚这一点，令人遗憾。

三、“文献阐释学”——能不能让作者说话？有人说回忆录应该由史家来解读，不能由作者自做解人，因为那会丧失客观性。对于这个问题，我不妨撷拾一个新名词——“文献阐释学”。这是我从后新学者那里刚学来的后新概念，赶紧用上，要不就忘了。

上述说法当然有道理，但那只在一般意义上有效。在特殊情况下，就必须请作者出来说话。比如，我们今天讨论的《邱会作回忆录》和《心灵的对话》，两书的当事人（编者或作者）对各自的书的真实性有不同的说法，这就需要拿出证据。有些证据研究者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识别真伪，有些证据是无论怎么研究，也研究不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事情绝对化。换句话说，研究者的任务不是拒绝当事人的解释说明，而是要把他们的解释说明也作为文献资料来研究。不要绝对化的意思还包括：当事人所说的，也不全是主观偏见；学者研究所得，也不全是客观事实。

比如，在《心灵的对话》所附图片中有一封 1985 年邱会作给儿子程光的信，因为此信的字太小，读者看不清。所以我征求程光的意见，能否在《记忆》上发表。如蒙俯允，我还建议他附上一篇说明性的文字，说明此信的写作背景，介绍一下老人家当时的心态。

这个作法是否违反“文献阐释学”的原则，我的回答是“不”。因为，有的事情，是研究者可以研究出来的，比如，邱信开头说了那两个“不反”，第一，“决不反毛主席。我的政治生命被谋杀是从毛主席开始的，但我还是不反毛主席，毛主席的旗帜是党和国家人民的利

益所在，反毛主席是最大的罪行。”第二，“决不否认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发生是有必然性的，对文化大革命应该这么总结：错误要批判，对造反派的罪行要清算。恩格斯说过历史总是历史，任何权威都是铲除不掉的，文化革命用一笔勾销的办法是办不到的。”

上述两个“决不”的含义大不相同。第一个“决不反”中的“不反”，意为“不反对”，也就是拥护毛。邱说的第二个“决不否认”，其中的“不否认”意为不掩饰、不歪曲文革。也就是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文革。

另外，邱信最后说：“我认为毛主席去世以来发生的事很多，似乎也很复杂，但综合起来不外是两个问题。一是反毛主席问题，二是经济改革问题。前者已经‘完成’了，后者还在进行。我坚决反对前者，拥护后者。”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邱老的思想矛盾：毛自称一生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就是文革。邱会作一再强调自己不反毛，这与他前面说的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是矛盾的。毛给新中国留下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邓小平改的就是这个经济体制。邱会作既然拥毛，就不能拥邓的改革。可是，他却“坚决反对前者，拥护后者”（反对反毛主席，拥护经济改革）。这里面的矛盾是一目了然的。显然，他所说的邓反主席，不是指邓在经济上反毛，而是指邓在政治上反毛。而在政治上，邓恰恰竭力维护毛。邱会作成为一个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就是邓在政治上维护毛的成果。

以上两点是我们作为研究者从文本中分析研读出来的。可是有些东西，无论研究者怎么“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也分析研读不出来。比如，我们不可能知道，邱会作给程光写这封信的原因和背景，也不可能知道，邱会作是否也给他的其他子女写了类似的信，不可能知道，这些子女在邱会作的回忆录的写作中起了哪些作用，对此书的成书过程有哪些影响。余此等等的事情，不是学者能研究出来的，是需要请教这类书的编者和作者的。

我认为，一个文献资料可能会有元文本，附加文本，衍生文本……。如果我们把《心灵的对话》看作元文本，那么，邱的这封信就是附加文本，而程光的解释，则是衍生文本。当然，这些文本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同样需要史学家的考证与研判。但是，我们不能排斥它。

解玺璋：今天上午来特别受教育。因为这些书平时看得比较少，吴迪让我看的书也没来得及看，今天听到的，对我来说很多都是新鲜事。但我还是很关心文革这件事的，我自己在文革发生时还很小，那年我才十三岁。现在，各位老师写的文章我都看，看跟当时留下的印象能不能对上号。

我听了大家这些说法有一个担心：一个历史事件会不会变成纯粹个人的道德化的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关心人物之间的关系，关心人物的性格、细节，如果没有更亲密的人把这些细节揭示出来的话，很多东西就靠对他性格的一个推测。虽然大家都觉得历史当中有很多偶然性，由于个人性格造成的历史事件的结局也是有的，可是我觉得，具体到文革，是不是也有思想上的，治国理念上的矛盾？比如毛跟刘少奇的分歧，有没有治国理念方面的？还是完全纯粹就是个人恩怨？就是对人身体的攻击？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除了研究文革的这些细节，是不是还要研究一下文革的思想逻辑，治国的思想逻辑？

我在写梁启超的时候，看了西方一些学者的政治理论书籍，他们有一个观点我还是挺认同的，就是政治设计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所谓政治无绝对之美），关键看你能不能把这个国家、民族、人民带上一条真正幸福的道路。那么我就不知道毛泽东、刘少奇他们的政治设计之间冲突到底在哪儿？这种冲突对文革有没有影响，还是纯粹就是个人恩怨，山头与山头之间的利益冲突，或者他们之间历史渊源造成的分歧，最后竟给整个民族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

再一个，如果我们不对文革的思想逻辑进行清理的话，其实对中国人的危害更大。大家上网的话就会感觉到，其实我们并没有走出文革思维这种逻辑。包括我个人都是这样，有时考虑问题，你说你恨文革，恨毛泽东，但用的还是他的这个思想逻辑，并没有跳出他的这个

圈子。比如邱会作也好，李作鹏也好，他们写东西有很多思想上、也许还有感情上的东西在里面，他们很可能会以他们以前的政治信仰，会按他们固有的思维模式去写。我们已经自觉地觉悟到要跟这种东西划清界限，可是我们划不清。我们的表述当中，我们的思想当中仍然有文革的东西存在。

我觉得这一百年对中国人的思想制造了许多混乱，而真正能够理清的东西很少，我现在就是一片混乱，我都不知说什么好。

我写梁启超有时就跟自己打架，按照我以前接受的东西我是写不下去的，我现在要写他至少我要接受他，理解他，所以，我天天在跟自己打架。有个朋友对我说，你写完梁启超就变成文化保守主义者了。因为以前我是比较激进的。我说我虽不能完全变成文化保守主义，但至少思想和认识都会开始有所变化的。

历史确实有偶然性，但历史确实也有必然性。为什么中国搞到文革这个份上？我觉得甚至不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是一百多年来历史一步一步推进的，越来越走向极端，最后变成这样。如果只是他们几个人的宫廷内部斗争，不会最后成为一个全民族都卷入的大事件。全民族卷入有的是被迫的，有的不是被迫的。虽然那时我很小，但目睹了很多历史事件，像清华大学的武斗、批斗王光美、揪刘火线，还参加了审判彭、罗、陆、杨的大会（我是挤进工体的。当时挺危险的，一个铁门关着不让我们进，我们一帮小孩子就往里面冲，冲不进去我们就爬大铁门，我还没爬进去呢铁门就被撞开了，如果不是解放军顶着那门让我们这几个孩子爬下来，都得被拍死在那墙上）。虽然年纪小，但我热衷于参与这些活动。我那时一天到晚不着家，天天在外面跟着一帮大孩子疯跑。我们、包括我自己，很多问题如果不清理的话，遇到现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就解决不了。你们做研究的如果在这一方面多提供一些研究的成果，至少让我们有些地方能明白一点。

（**周七月：**我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一个王朝不断更迭的历史，一直到现在，毛泽东不过是皇帝之一。之所以发生文革造成那么大的危害，就是因为他把农民起义包了一层外衣。很多人认为我们干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它实际上还是宫廷内部的斗争，因为有了这个外衣好多人就裹了进去，而且是很热情的裹了进去。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很多人就清醒了，如果我们再去研究这个外衣本身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事情。我们应该去追问我们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革这样的事情，到现在造成的危害是什么，然后将来我们该怎么走，这才是我们的研究重点所在。我觉得反而是像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这些下层的人提出了很多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反思文革，这才是真正积极的东西。）

如果中国的历史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王朝更迭的历史，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走出这样的历史？什么样的思想逻辑造成了中国人会困守于这种历史之中？怎样才能结束这样一个东西？如果中国人不能走出这样一个历史逻辑，那就没什么希望了。

郑仲兵：谈几点看法，求教于大方：

一、对林、毛在文革中分歧和矛盾发展的认识。有人说，矛盾开始于九大；也有人说矛盾始于九届二中全会。我认为矛盾几乎贯穿于文革的初期至九一三的整个过程。关键的、也是本质的问题是，毛要军队支左、支持造反派，而军队基本倾向是支右、支持保守派。1967年初的“二月逆流”和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都是抵制文化大革命，都是对毛文革做法的抗争。两次抗争的导演都是林彪，只不过前一次他是后台，后一次他从后台走向前台。两次都是失败的抗争。“二月逆流”被整肃后，林彪的势力反而在“三支两军”中得以膨胀，而九届二中全会后，林的势力彻底覆没，军队基本退出文革舞台。但毛最终也无法挽救文革彻底失败的命运。

二、对九大到九届二中全会斗争的认识。我认为，九大是毛、林矛盾开始爆发，九届二中全会为总爆发——设国家主席和关于“天才论”之争，不过是由头。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

上采取主动攻势表明，他已感受到毛对他的亮牌不可避免，他的抗争实质是孤立中央文革势力，要求结束文革，结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转向经济建设的斗争。抗争具有一定的正义性。有人以双方是权力斗争来否定其正义性，其实在专制体制下，这样的权力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专制主义之所以得以实行，就在于绝对权力，用其他方式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关键，要看斗争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有利于人民的利益。

三、对“九·一三”事件的认识。说林彪蓄意叛逃是没有根据的，这个事件是毛处心积虑要扼杀林彪的结果。它的性质和毛迫害刘少奇一样。一个是国家主席，一个是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法定接班人。“九·一三事件”意味着毛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已穷途末路，是未宣告结束的结束。

四、对批林整风和审判林彪集团的认识。批林整风是毛在穷途末路下无可奈何的倒行逆施；把林彪等人作为反革命集团审判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邓小平制造的一大冤案。

五、关于制造贺、罗、杨冤案毛、林责任的辨析。我认为，三次皆为毛的意志所为，主要责任人当然是毛，但林彪也有一定责任。贺、罗的冤案与毛要端掉所谓刘邓司令部、恐惧政变心理有关。杨案是杀鸡给猴看，猴子就是林彪（当然也包括周恩来）。所谓“端出”王关戚是毛对林彪、军方的妥协；打倒杨余傅则是毛借题对林的反击和林对毛的妥协。

六、对林彪的历史评价。林乃旷世奇才，不仅是军事天才；在与斯大林谈判、与蒋介石谈判中都有卓越表现；反对出兵朝鲜，表明他的眼光；毛在几次危难时期他都出来表态，说明他是毛的嫡系；同时他也是在毛确立了领导地位以后的中共历史上仅有的敢于顶撞毛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为彭德怀），以及具有“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自期卓尔不群的人；还是中共党内少有的博览群书的人；文革的发动他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文革中他有许多不负责任的言行，但必须承认他又是毛在文革中最有影响的抵制者。

七、怎么看文革前林毛的历史关系？林是毛的嫡系，最喜欢的人之一；他也是中共最了解毛的思想品格的人；又因历史上战功卓著，在军队威望高、势力大，加上身体不好，林解放后主要采取韬晦自保，而仅有的几次亮相，如第一次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主持军委工作期间，都以绝对拥毛而受到毛的特别赞誉，成为毛在党内斗争中的杀手锏。

八、对吴、邱、李、黄回忆著作和其它遗著的评价。在官史的一片谎言中，这些作品亮出不少真话、真情，有不可替代的第一手的史料价值，当成为传世之作。

（根据录音整理，部分发言未经本人校订。）